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 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侯为刚*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微观认知心理机制、来解释国家对外政策议程为何时而凸显合作、时而转向竞争的演变逻辑。考察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发现,为保持与自身愿望一致,莫迪政府会通过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类锚定效应,以及愿望思维、独立型自我图式这类机制来识别中方意图及判断自身面临的处境,并据此设置对华政策,这表明战略自主性是调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动力。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导向需求成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趋于强硬的一项重要心理机制。在固有认知局限的影响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总体上表现出竞争中有限合作的特征。最后,文章尝试对未来如何管控双方分歧提供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启示。

【关键词】 莫迪政府 对华政策议程 锚定效应 战略自主性 认知局限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2.03

引言

一国对外决策往往受其掌握的信息以及固有的认知思维模式的影响。在既有的认知模式影响下,如果一国过度识别或放大他国的威胁,往往会引起冲突;如果低估、甚至忽略他国捍卫主权和安全的能力和意愿,同样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由此不难引出一问题:认知模式如何影响一国对外政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策议程的设置? 2014年5月莫迪政府施政以来, 其对华政策议程总体上呈现加强与中方合作以及与中国竞争和对峙的二元特征。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为何会呈现时而凸显合作倾向、时而又以竞争属性为主的螺旋式演变特征? 既有研究围绕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进行了诸多讨论, 但倾向于探讨对华政策的竞争或合作的单一属性, 抑或将该问题放在权力格局这类结构背景下考虑, 缺乏为之提供更为微观的理论阐释。在差异性发问的原则启发下,^① 本文尝试整合莫迪对华政策的竞争与合作双重属性, 并由此指导理论的选择和案例的界定。为弥补上述局限, 本文尝试基于行为体固有的认知模式来提炼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演变的认知心理机制。具体而言, 文章以2014年5月至2021年这七年里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过程为分析对象, 研究发现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合作与竞争两种逻辑交织并存的演变特征。其中, 政治精英的诱发定势、历史类比以及愿望思维、独立型自我图式等固有的认知模式影响了莫迪政府对相关信息的解读与判断, 进而左右其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在特定的认知模式作用下, 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总体上表现为竞争中有限合作的态势。

本文对政策议程属性的界定主要借鉴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主张, 随着时间的变化, 媒介报道中的议题将成为受众认为重要的话题。^② 麦库姆斯主要从议程的属性和议题两个维度来考察显要性从媒介议程向大众议程的转移过程。^③ 这一理论随后被运用至公共政策、国际关系等领域。^④ 本文探讨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变迁逻辑, 主要强调政策议程的合作与竞争两个基本属性。本文不仅具有理论上的解释价值, 也有现实政策回应的应用功能。理论上, 基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合作与竞争双重属性的演变历程探索, 有助于发展竞合主义这一新型的国际关系

① 本文提出这一差异化问题是建立在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发问基础上。关于差异性发问, 可参见赵鼎新:《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5期,第113~134页。

②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1972, pp. 176-187.

③ [美]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④ 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86~99页;杨成:《提高中国外交的议程设置能力——构建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关键》,《文化纵横》,2016年第2期,第22~29页;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6期,第106~131页。

或国际安全理论范式。^① 在不完全信息背景下，行为者固有的认知模式是诱发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心理根源，并驱使其对华政策呈现合作与竞争螺旋式交织演变的特征，表现为竞争主导下的有限合作。从现实层面看，这一趋势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印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为更有效地应对印度对华政策，中方应考虑印度政治精英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局限。印度则应准确识别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决心和能力，避免战略误判。

一、文献回顾

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现阶段南亚研究领域重点关注的内容。既有研究主要从国际安全局势、印度国内政治等结构性视角来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内在逻辑。为弥补现有研究在微观心理层面的解释局限，本文尝试基于行为者认知模式的视角来解释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动态演变过程。

（一）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既有解释及其局限

探析印度政府对华政策的动态是南亚研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莫迪政府在政治、安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涉华政策表现。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围绕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合作或竞争单面向展开分析。关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偏好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结构性和时间序列这两种叙述痕迹较为清晰。

其一，权力冲突视角是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变迁的基本视角。一些研究基于国际格局演变这一宏观背景，考察莫迪政府的“东向政策”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安排。^② 中印实力差距的扩大加剧了莫迪政府对华的警惕和忧虑。莫迪上台之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国防开支是印度的四倍，中方加快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这或许让莫迪政府意识到，中印边界争端的解决随着双方实力差距的扩大将更为棘手。^③

^① 储昭根：《竞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探索》，《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8期，第43~52页。

^② 关于莫迪政府的“东向政策”探析，可参见李莉：《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1期，第37~45页；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南亚研究》，2015年第1期，第62~79页。

^③ [印]拉贾·莫汉：《莫迪的世界：扩大印度的势力范围》（朱翠萍、杨怡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17页。

与此同时，中印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也可能会影响莫迪政府对华态度。一方面，美国对华遏制以及印美关系回暖，促使印度认为中国与其对抗的能力和意愿受到限制，进而增加其对华强硬的“底气”，行为上更加冒进。^①不过，洞朗危机后印度主动释放缓和印中竞争的信号同样受美印关系降温的影响。^②另一方面，印度对巴基斯坦固有的敌意与中巴关系紧密化之间的张力，是塑造印度国内对华印象的重要因素。^③此外，从国内政治、社会结构方面看，自由民主体制固有的观众成本会驱使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努力把握中国发展给自身带来的机遇。^④不过，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样给莫迪政府采取对华强硬的措施增添了舆论压力。例如，印度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色彩，是莫迪政府对华强硬、甚至造成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底色。^⑤高昂的观众成本与较弱的边界议价能力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则驱使莫迪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态度更趋于强硬。^⑥

其二，部分研究注重考察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态度演变的历时性特征。作为南亚次大陆唯一的大国，领导型大国的愿望思维意味着自独立以来印度对外政策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此外，印度高层对“安全缺口”的历史记忆，将西藏地区作为中印战略缓冲区和印度北部安全的天然屏障的理念，这种绝对安全的思维可能造成某种“陆锁式”安全困局。^⑦这种历时性特征还体现在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路径依赖”偏好，此前印度政府对华政策多基于领土争端展开。就个人成长历程而言，莫迪在过去从政经历中

① 叶海林：《身份认知偏差对中印关系前景的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2页。

② 谢超：《中印洞朗危机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因素》，《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6期，第45~60页。

③ 唐璐：《印度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与公众舆论对华认知》，《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1~14页。

④ 包善良：《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边境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11期，第26~34页。

⑤ 胡仕胜、王珏：《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行为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7期，第25~34页。

⑥ 邢瑞利：《印度对华强硬政策背后的声誉动机分析——以中印边界问题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69~78页。

⑦ 胡仕胜、王珏、刘传玺：《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0年第4期，第1~23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形成的务实、坚韧等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执政后对华的政策偏好。^①与此同时，印度国内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意味着莫迪政府设置对华政策可能享有更高的自主性。一方面，与过去政府的“联盟”属性不同，在2014年印度议会选举中，印人党获得282个席位，独自组成政府，这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增添更多自主空间；^②另一方面，国内权力关系的变化还影响到军政部门的协调能力，进而左右莫迪政府对华惩罚性威慑的效果。^③

既有研究主要从结构和时间两个维度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变动过程及特征提供了部分解释，有助于读者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基本现状及宏观背景。然而，上述研究对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为何会呈现时而缓和、时而紧张的复杂现象的解释略显不足：首先，多数研究聚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竞争或合作阶段这样的单一历程（如仅分析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对华的合作前景，或强调印度对华的制衡或战略威慑这类竞争性逻辑），未有效把握合作与竞争这两类属性的交织演变特征。其次，单一的结构解释忽视了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非线性特征，难以解释其对华政策为何会在缓和与竞争两个属性向度间摇摆的不确定现象。尽管部分研究指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只是其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但不足以解释为何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时而凸显合作倾向、时而又强化竞争属性的复杂现象。最后，既有研究主要强调宏观结构性物质因素的作用，忽视了微观认知心理因素的功能。作为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信息与认知这类微观因素较少得到关注。认知心理学主张，作为处理信息的基本模式，自我图式是特定领域内关于行为体行为的记忆、信念的集合。^④自由民主政体下的自我图式以独立型自我图式为典型，表现为独立的、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这类特质。^⑤由此不难理解莫迪政府对华决策时可能会低估中方捍卫领土安

① [印] 金舒克·纳格：《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陈义华、霍舒缓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

② 楼春豪：《莫迪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转向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7期，第19~28页。

③ 谢超：《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34~54页。

④ Hazel Markus, "Self-schemata and Process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lf,"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No. 2, 1977, pp. 63-78.

⑤ [加] 齐瓦·孔达：《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周治金、朱新秤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页。

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和能力,甚至认为中国会按照此前的经验来处理当前中印间的矛盾,因而更倾向于通过冒进方式获得战略优势。

(二) 认知模式: 一项微观心理的解释

在民主体制下,政府对外政策议程往往受制于政府议程、公众议程以及媒介议程的合力。与非民主体制相比,自由民主体制中能够制约媒体自由发表言论的力量更为有限。这意味着在信息流动较为充分的舆论环境中,尽管政府对外决策可能会克服信息不足的弊端,但也可能由于信息过剩而导致决策失误。其中,主导公共舆论方向的政治社会精英的价值偏好及其认知模式可能影响政府涉外政策。科学决策的基础是对信息的有效掌握和准确识别,而这一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会受制于行为者的认知和偏好。华尔兹的第一意象强调,冲突的最主要根源在于人的本性和人类行为。^①这意味着关键人物的认知模式在一国对外决策过程中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同时,静态的结构性因素往往需通过信息的传播与接收这类更具动态性的微观行为活动得以发挥作用。为此,行为体的认知模式对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变迁具有基础理论价值。认知心理学指出,个体为了保持与自身既有信念体系相符,会形成特定的认知模式,包括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类认知模式以及愿望思维、特定的自我图式这类动机模式。^②

一些研究从价值信仰、环境因素以及学习过程三个方面阐释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心理起源。^③在信息技术时代,信息接触偏好和接触到的内容往往会影响印度民众对中国的形象认知。^④这类研究对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态势演变有诸多启发。其中,错误知觉理论一方面会强调行为者高估对手的敌意会造成敌意的螺旋上升,进而陷入安全困境。^⑤例如,印度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对华固有的形象认知不相符,同时倾向于用“珍珠链”战略思维来理解“一带一路”倡议,认为这是中方对印度的升级版包

① [美]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4页。

②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③ 随新民:《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来源——从社会认知视角分析》,《南亚研究季刊》,2006年第3期,第68~73页。

④ 郑斌、许少民:《印度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1~15页。

⑤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67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围策略。^① 另一方面, 错误知觉理论也强调行为者一旦低估了对手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和声明, 同样易引发冲突。^② 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觉模式更易使莫迪政府产生单边默契, 进而加剧对中国崛起的抵制。^③ 这些错误知觉及莫迪政府对华强硬态度与印度长期以来对华的敌意身份意识的构建历程密切相关。^④ 另外, 印度国内既定的媒介结构有助于通过凝聚民族主义情感来塑造公众对华的形象认知, 表现为民众的选择性信息接触与主流媒介塑造对华负面印象之间的有效匹配。^⑤ 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变迁提供了不同于宏观结构背景的微观认知心理视角, 但未能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案例加以检验。

作为认知和观念的表征, 制度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认知模式。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强调, 以自我为中心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元理论, 其中对实力(安全)的追求和观念的冲突则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两个基础变量。^⑥ 这为理解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提供了理论上的启发。^⑦ 作为观念变异的表征, 政策变迁很大程度受既定认知模式的约束。与知觉理论相关的是, 自我图式和国家自主性理论对理解行为者的态度变更或维持具有基础价值。一旦涉及对外决策, 行为体可能会忽略或低估对手的战略决心与能力。然而, 当面临战争等非常态局势, 在信息接收与评判过程中, 国家行为体的潜在自主性可能发挥调节作用, 以更好地把握局势。^⑧ 结合自我图式和国家自主性, 或许不难理解莫迪政府对华认知会表现为正确认知和错

① 杨胜兰、朱新光:《美国、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学术探索》,2017年第8期,第53~59页。

② 尹继武:《私有信息、外交沟通与中美危机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第71~99页。

③ 胡仕胜、王珏、刘传玺:《从加勒万河谷冲突看印度陆锁式安全思维困局》,第1~23页。

④ 朱翠萍、[美]科林·弗林特:《“安全困境”与印度对华战略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6期,第26~46页。

⑤ 陈小萍:《印度对华安全认知与政策选择: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视角》,《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3期,第7~14页。

⑥ 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沈文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9页。

⑦ 一般而言,政策是更具体化的制度,为表述方便,本文并不对制度与公共政策做详细的区分,而是将二者等同。

⑧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3页。

误知觉两个维度，使其对华政策呈现出刚性对冲和合作并存的二元特性。^①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在梳理既有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分析框架、核心概念、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案例的时间限定这几个方面做进一步阐述。

（一）分析框架

固有的认知模式往往会影响行为体对信息的接收和解读，塑造特定的知觉类型，进而左右其决策。认知心理学强调，行为体对信息的选择和回应本质上是保持与其既有的信念和认知相一致，这种“信息匹配”的过程即认知相符原则。认知心理学家海斯蒂认为行为体的判断策略基于某项“凸显的值”（即“锚”）并据此对自己的评估加以调整。^② 为了保持认知相符，行为体往往会启用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类基本的锚定思维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行为加以调整或矫正，以符合认知体系。然而，在不确定情境下，行为体的愿望思维和自主性这类基本的动力机制也可能被激发、启动。鉴于此，本文形成关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变迁的一项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本文的核心解释机制认知相符原则，即保持与自己的认知相符，避免认知失调，^③ 是印度政府决策者处理信息与设置对华政策议程的一项基本心理机制。在锚定效应和愿望思维、自我图式这些影响行为体知觉的辅助机制的作用下，印度对华政策议程的基础心理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莫迪政府为保持与自身既定的认知体系一致，在与中方互动过程中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进而主动挑起系列边境争端行为，凸显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竞争属性。其二，在中印领导人多次会晤并加强战略沟通的互动过程中，莫迪政府也可能产生过与理性相符的认知，从而缓和双边紧张局势，促进合作。

① 刘红良：《论印度对华政策的对冲刚性与合作韧性》，《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8页。

② 在信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锚定—调整启发式主要探讨人们如何处理信息。参见：[美]雷德·海斯蒂、[美]罗宾·道斯：《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第2版）》（谢晓非、李纾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第73~86页。

③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127~135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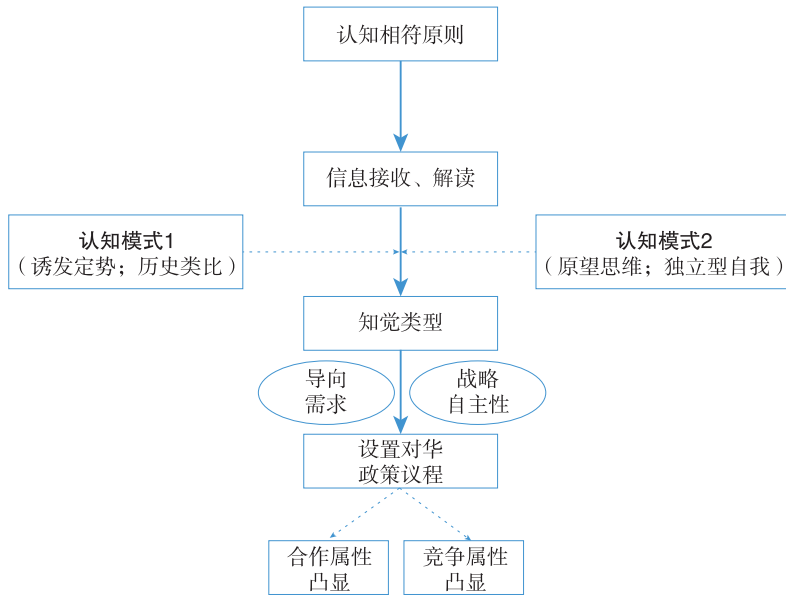


图 1 莫迪政府设置对华政策议程的认知心理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 概念阐释

在厘清既有研究的脉络前，有必要对本文的核心概念做澄清。首先，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属性演变是本文的结果变量。既有研究或是分析莫迪对华政策态度的合作倾向的动因，或是关注竞争趋势的动因或现状，这种对单一议程属性的考察分析难以全面呈现莫迪政府对华决策的演变面貌，得出的结论较为片面。本文旨在揭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变迁的一般逻辑。为此，根据议程设置的属性维度，本文着重考察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竞争（冲突）属性和合作（缓和）属性这两个维度。将合作和竞争两种属性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并做比较，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全面、客观。基于对印度对华政策实践过程的观察，自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华政策议程设置态势的合作属性或竞争属性较为凸显。尽管这一操作方式较为粗糙，但整体上能勾勒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变迁的基本态势。

其次，认知模式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根据一国对外政策议程设置的合作与冲突两个基本向度，莫迪政府对华的知觉模式体现在知觉与错误知觉这两个维度。一方面，正确的知觉模式表现为能相对准确识别中方发出的信号和意图，进而缓解战略竞争压力，积极推动边境谈判和促进经贸

合作。另一方面,有研究将错误知觉分为无意识错误知觉和有意识错误知觉,前者与认知能力有关,后者具有主观故意或某种动机。^①一般而言,人们讨论的错误知觉多指无意识错误知觉。错误知觉模式可能表现为印方将中方想象得过于强大而强化某种“威胁感知”,或过高估计自身实力与影响力,抑或是在较强的愿望思维主导下期待中方能满足自己单方面的设想要求,这可能成为引发中印边境争端等战略竞争的重要心理条件。国际政治心理学主张,在认知相符原则指导下,诱发定势、历史类比这些基本的锚定认知模式以及自我图式、愿望思维这类动机模式可能使行为体客观上产生错误知觉。

(三)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旨在寻求因果解释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取向:一是基于某项后果,寻找结果的原因(cause of outcome),即“由果溯因”;二是基于大样本数据,检验原因的后果或影响(effects of cause)。^②前者遵循“由果溯因”的研究路径,主要通过因果过程观测或案例间比较以揭示结果差异的具体机制,但在行文时应避免由结果倒推原因或循环论证的倾向。本文基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变迁的实践历程,尝试提炼出一套用以揭示一国对外政策为何时而缓和、时而紧张这一差异现象的动力机制。

在案例的时间限定方面,本文选取2014年5月至2021年12月该时期内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作为分析对象。尽管莫迪政府本届施政周期尚未结束,但仍可展现较为充足的动态性。在材料选取和运用方面,本文主要以媒体报道和相关部门的表态作为分析材料。其中,选取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在政治、军事、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领域发生的较为经典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并结合认知心理分析框架,以期勾勒出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呈现“时而合作,时而冲突”偏好的内在逻辑。

三、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将围绕莫迪政府对华决策的基本演变历程及其背后的认知心理逻辑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① 谢超:《洞朗对峙中的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61~89页。

^② 唐世平:《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9页。

(一) 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基本演变历程

在过去七年里，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表现为有时能较准确地识别中方意图，调整其对华政策，促进双方合作；有时忽视甚至错误评估中方的意图，采取强硬的对抗性手段，进而加剧双方的冲突。总体而言，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呈现合作（缓和）与竞争（冲突）这两类政策属性螺旋式交织并存的基本特性（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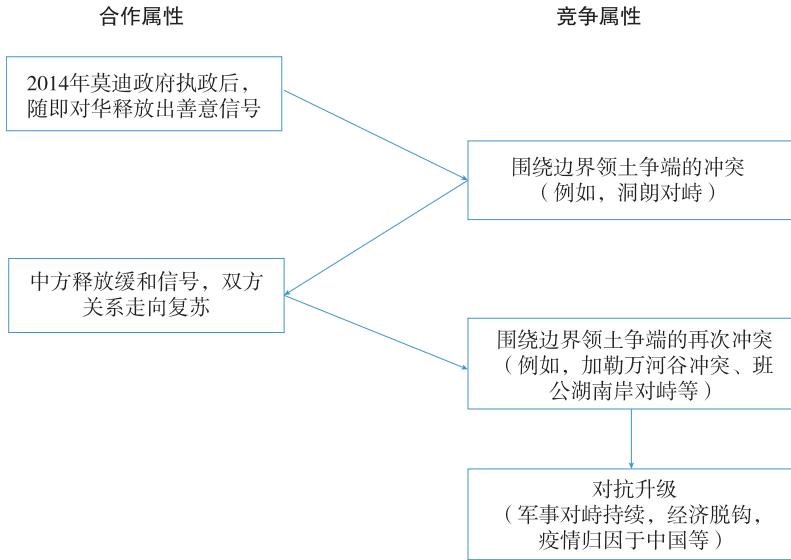


图 2 莫迪政府设置对华政策议程的合作与冲突属性共同演变图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莫迪政府设置对华政策议程的合作属性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一是莫迪执政之初，双方领导人实现互访，并积极推动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二是洞朗对峙结束后双边关系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具体而言，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随后印度出台放宽对中国前往印度的公民审查的政策。2015年5月，双方在中印经贸论坛上签署的合作协议涉及能源、钢铁、金融等领域，金额达220亿美元。^① 2016年10月，在新德里举行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又

^① 《中印经贸合作迎来新的机遇期》，中国财经，2015年5月17日。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50517/3121516.shtml

签署了16项合作协议,金额达160亿美元。^①在第二个合作阶段,洞朗对峙结束后不久,双方领导人于2018年4月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莫迪政府也向中方释放了促进信任和保持战略沟通的信号。在随后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上,印方同意加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实现互联互通。^②此外,莫迪于同年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印度的其他关系没有一个比印中双边关系更有层次,印度在处理边界问题方面表现出了成熟与智慧。^③在2019年10月,莫迪与中方领导人进行了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此时双方贸易金额近千亿美元,高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④诚然,在合作属性凸显的对华政策趋势下,在军事安全方面莫迪政府为缓和对华政策的紧张态势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例如,在此期间莫迪政府在参与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方面表现得较为谨慎,会兼顾中方的顾虑,莫迪表示印度从没将印太地区视为少数成员的俱乐部。^⑤

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竞争属性同样体现在两个阶段:一是2017年8月经历的洞朗军事对峙阶段;二是2020年以加勒万河谷冲突为代表的对峙阶段。莫迪在就职宣言中传递出建立“网状的联盟体系”的信号,以应对中国崛起,确保印度的安全。^⑥随着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推进,印度认为这威胁其在南亚的主导优势。^⑦2016年,莫迪相继访问美国、日本,完成“东向行动政策”与印太战略的对接。2016年年底,印度宣布发现中国一艘核潜艇在印度洋活动,并通过飞机和船只严密监控。

① 《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在新德里举行》,新华网,2016年10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07/c_1119669932.htm

② 《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在中印关系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共同谱写龙象共舞的新乐章》,中国外交部网站,2018年5月6日。<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gdxw/t1556970.htm>

③ 《印度莫迪总理在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式上所做的主题演讲》,观察者网,2018年6月5日。https://www.guancha.cn/modi/2018_06_05_459037_s.shtml

④ 《习近平金奈之行:中印经贸合作迎新机遇》,中国新闻网,2019年11月11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9/10-11/8976349.shtml>

⑤ 《印度与美日澳投资“印太”保持距离,不愿与中国“唱反调”》,参考消息,2018年8月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80808/2306564.shtml>

⑥ “Election Manifesto 2014,” Bharatiya Janata Party, pp. 1-10. <http://cdn.narendramodi.in/wp-content/uploads/2014/04/Manifesto2014highlights.pdf>

⑦ Raja Mohan, “Network is the Key: India Must Ramp up its Internal Connectivity to Count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Indian Express*, May 9, 2017.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network-is-the-key-4646728/>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2017年6月,印度干涉中方在中不边境的道路修建计划,^①爆发了规模较大的洞朗对峙事件。随后与美日澳重启“印太”四方安全机制。另外,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以及美国加强对华遏制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竞争属性更加凸显。其中,经济上加大对华反倾销力度,禁止多款中国手机应用在印度的使用,全面升级中国在印资本的安全审查。^②除了经贸领域,莫迪政府在边界问题上也再度对华示强。2020年上半年,印度率先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修路架桥,单方面改变了当地现状,随后爆发了自中印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加勒万河谷冲突,双方均有人员伤亡。同年8月底,印军抢占班公湖南岸高地,导致双方在班公湖地区继续对峙,而随后印军再次非法越线,占领并控制热钦山口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边境对峙局势。这些行为无不凸显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冒进特性,“先发制人”的意图相当明显。

总体而言,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一方面试图向中方展现合作意向,另一方面又显示对华强硬。那么,为何莫迪政府在施政之初对华政策能考虑到中方需求并呈现合作意向,随后却表现出为了自身的“安全关切”而不顾自己的行为给对方的安全造成威胁的竞争意向呢?换言之,莫迪政府对华决策何时以及如何能保持认知相符,何时又为何会出现认知不相符?在梳理基本现状后,笔者尝试对该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二) 认知模式与对华政策议程设置

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主要呈现出竞争属性与合作属性螺旋式交织演变的特征,即“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的有限合作。本文将基于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来解释为何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时而呈现合作趋势又时而又转向以竞争为主。

1. 诱发定势、历史类比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

诱发定势的知觉类型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属性。认知心理学强调,人对特定信息的接收、解读与回应往往需与其既有的认知或信念体系保持

^① 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不丹王国,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的附属国,其军事设备、费用主要由印度提供。

^② 例如,印度国家控制的最大炼油厂宣布将停止与中国海洋石油、中石化、中石油等公司的原油贸易往来。Nidhi Verma, “Indian State Refiners Have Stopped Buying Crude Oil from China-linked Companies,” Nasdaq, Aug. 27, 2020.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exclusive-indian-state-refiners-halt-oil-imports-from-chinese-cos-sources-2020-08-27-2>

相符, 否则会出现认知失调。其中, 锚定效应是个体为保持认知相符的基本认知模式, 包括诱发定势、历史类比等基本思维模式。一方面, 诱发定势机制强调行为体在接收新信息时, 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或考虑的议题为定势(即为“锚”), 据此来解读自己所接收到的信息, 并做出回应。^① 然而, 在认知心理学看来, 决策者倾向于认定其他人的关注点与自己相同, 但事实却是各行为体的关注点往往不同, 各自的诱发定势可能存在差异, 进而导致决策出现偏差。^② 结合研究对象看, 莫迪政府坚持解决边境问题是发展中印双方关系的前提, 边境问题会外溢到其他领域。^③ 这种非领土安全问题的领土安全化思维往往会忽视中方处理边境问题的态度和基本立场, 即边境争端不应与双方关系挂钩, 暂时搁置争议, 积极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和人文等领域的沟通。在诱发定势作用下, 莫迪政府对中方释放的信号的理解可能与中方意图存在偏差。在军事和安全领域, 莫迪政府一度表现出绝对安全思维, 即认为西藏地区是中印的战略缓冲区和确保印度北部安全的天然屏障。这样一来, 中方对边境地区的开发很大程度上与其绝对安全思维不相符, 对中方相关信息的接收和解读可能造成其认知上的失调。为了缓解这种认知失调, 莫迪政府会投入更多力量部署在边境, 以应对中国的“威胁”, 由此形成特定的“安全困境”。^④ 其中, “珍珠链”战略思维属于悬在莫迪政府头顶上的“想法”, 印度倾向于将中方在南亚地区推行的“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活动视为旨在压缩印度发展空间战略“威胁”, 这样的认知可达性模式可能激发印方的不安全感。对此, 莫迪政府就加入该倡议始终未做出实质性的回应。例如, 印度缺席2017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甚至一度将涉及克什米尔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视为对印度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⑤ 与此同时, 莫迪政府积极推行“季风计划”、与日本共同主导“亚非增长走廊”, 在客观上与中方提出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 第223~224页。

②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 第231~233页。

③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2021年1月28日提出中印关系八项原则, 其中第三项强调边境的和平和安宁是发展其他领域合作关系的基础。参见:《印外长强调中印关系并提“八项原则”》, 文汇报网站, 2021年1月29日。<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2101/29/390320.html>

④ 杰维斯较早对安全困境这一现象进行过深入探讨。See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⑤ 《印度官员宣称: 中巴经济走廊侵犯“印度主权”》, 环球网, 2017年2月23日。<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9CaKrnK0JPA>

的“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某种竞争。

历史类比、知觉类型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重要属性变迁。一方面，历史类比可能诱发莫迪政府对华认知出现偏差。作为一种思维捷径，历史类比主要表现为行为者在 T 时刻对信息的处理及反应会受其在 T-1 时刻的经历的影响，^① 即“古”为“今”锚。例如，过去遭受毒蛇威胁的经历容易使人们将路边的绳子看成蛇。同样，此前历史经验的习得也给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或调整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莫迪政府对华示强逻辑而言，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的惨败无疑加剧了印度的“受害者”心态和道德制高点，^② 该记忆促使莫迪政府积极寻求对华采取强硬措施的契机。历史上遭遇的失败教训在某种程度上放大行为体对他国的威胁感知，这一认知模式一旦在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或调整过程中占据主导，很可能会遮蔽其对双边实力的非对称现状以及中方捍卫领土主权的决心的准确认知。^③ 历史经历与创伤记忆对行为体的知觉与行为的塑造在西方民主社会内部也同样存在，例如二战后法国的“受害者”心理阴影一度挥之不去，缺乏对联邦德国的信任。^④ 然而，作为一种启发式认知捷径，历史类比也可能促使莫迪政府对中方形成相对准确的知觉，进而促进合作。莫迪早期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便注重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任职期间多次访问中国，鼓励中国企业投资该邦。^⑤ 与此类似，在莫迪执政之初，印度对华政策也凸显经贸合作的议程属性。在洞朗对峙结束后的回暖阶段，莫迪政府同样释放出希望中国加大对印度投资，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合作信号。同样，早期在地方主政时，处理复杂危机事件给莫迪执政后处理更加复杂的对外事务带来了诸多经验。例如，面对 21 世纪初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重大骚乱，在尚未掌握足够信息的情况下，莫迪决定停止当天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 239~243 页。

② 马荣久：《“受害者心理”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决策为例（1959—1962）》，《国际政治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74~183 页。

③ 尹继武：《单边默契、权力非对称与中印边界战争的起源》，《当代亚太》，2016 年第 5 期，第 33~65 页。

④ 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5.

⑤ [印] 金舒克·纳格：《莫迪传：从街头小贩到大国总理之路》（陈义华、霍舒缓译），第 12~13 页。

的会议议程，亲自前往事发地，果断处置该事件。^①不难看出，早期累积的施政经验使其执政后在设置或调整对外政策议程这样更具挑战性任务时具有一定的基础。

2. 独立型自我、愿望思维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

作为理解认知相符的另一类辅助机制，独立型自我图式和愿望思维主导的认知模式可能左右印度对涉华信息的判断及其对华决策。其中，独立型自我是自由民主体制中较为典型的自我图式，主要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进而可能低估或忽视对手的意愿和能力。作为南亚次大陆的“传统霸主”，印度大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与中国介入南亚地区的客观态势间形成了某种张力，^②可能阻碍其对华的正确认知。同时，这意味着莫迪政府对中方发出的信号、意图的解读与中方的本意可能存在偏差。与此前国大党不结盟的政策理念不同，为寻求国家利益和安全最大化，莫迪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建立联盟网络以提升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国际秩序，从传统的封闭不结盟转向战略自主。^③在此过程中，可能使莫迪政府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以自我为中心的独立型自我图式往往会强化其愿望思维，从而表现出对华政策的强硬特征，最终可能出现“侵略方会低估防卫方捍卫本国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冲突便爆发”的情况。^④除了表现为政策制衡上的冒进，独立型自我也可能凸显“软制衡”行为逻辑。例如，莫迪政府为平衡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影响，提出相应的经济发展计划，采取非军事手段来牵制中国，以降低对抗成本，同时占据对华战略决策的主动性。^⑤不难看出，在非领土领域的争端方面，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态度主要表现为回避正面冲突的“软制衡”行为逻辑。当独立型自我图式表现为行为体倾向于过

① [英] 安迪·马里诺：《莫迪传：一位印度传奇总理厚积薄发的权力朝圣史》（杨敏敏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

② 戴永红：《中印美俄在南亚的“一核两体”战略格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1期，第48~55页。

③ Sushant Singh, Raja Mohan and Raja-mandala, “The Final Burial of Non-alignment, the Indian Express,” *The Indian Express*, Nov. 17, 2015.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raja-mandala-the-final-burial-of-non-alignment/>

④ Thomas C.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rospectu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Game Theor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 No. 3, 1958, pp. 203-264.

⑤ 胡娟：《印度对中国的“软制衡”战略：动因、表现与局限》，《南亚研究》，2018年第3期，第18~33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高估计自己的影响时，莫迪政府容易将中方寻求和平谈判的意愿和信号视为中方软弱、不敢与印度进行对峙的表现，进而可能导致战略误判，即倾向于认为保持竞争和强势态势可使中方做出让步，从而实现印度在领土和安全领域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国际局势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的战略自主性。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一度加强对华遏制，这影响了印度的战略误判，认为中方受美国等国家的牵制，应对西部边境争端的实力遭到限制，进而高估自身在边境争端中的优势。与此相对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图式还表现为低估甚至忽视对方的意愿或能力。面对双方实力差距的扩大，决策者更倾向于夸大外部威胁，进而通过国内动员、采取冒进政策占据优势等途径以增强自己的防御，从而缓解其建构的安全困境，但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方的利益诉求和安全感知。事实上，早在殖民时期提出“印度处于亚洲的心脏地带”的寇松战略，^①便是印度以自我为中心的直接体现。

伴随着权力关系的调整，战略自主性可能带来小集团思维，造成错误知觉，进而表现出对华强硬的一面。2017年，莫迪政府推动国家安全委员会体制改革，国家安全顾问的权限加大。情报负责人阿吉特·多瓦尔倾向于采取对华防范措施。至此，莫迪政府对华决策圈形成以总理莫迪、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外交部长苏杰生为核心的组织架构。总理、总统、下议院和地方邦的机构职位大都被印人党垄断。这种同质性群体组成的权力核心决策圈，在外交决策时容易产生贾尼斯所指的小团体决策思维，表现为为追求群体内部一致，忽视那些与群体决定不一致的信息或声音，形成一种“共识”假象，进而导致决策失误。^②与此同时，国内权力竞争也可能促使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例如，国大党批评莫迪在2020年6月提及的“无外方人员进入印度领土”的说法，认为这是向中国服软，将印度领土拱手让人。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莫迪政府随即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此外，近年来莫迪政府限制中国手机应用在印度境内的使用，以及调动更大规模的军队并解除军方在中印边

^① A. Acharya, "Can Asia Lead? Power Ambi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4, 2011, pp. 851-869.

^② 决策成员追求团队一致性，可能导致获取的信息不足、处理有限信息时存在高估自身实力、道德等偏见后果。参见 [美] 欧文·贾尼斯：《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张清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193页。

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开火限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随后爆发的班公湖等冲突事件，加剧对华政策的竞争属性。

然而，独立型自我图式所展现的自主性也可能有效识别对手善意的信号，并积极引导舆论产生促进双方合作的正面效果。国家战略自主性理论借鉴斯考切波对革命的研究，她认为国家拥有不同于主导阶级所倡导的目标的自主性。^①莫迪政府的自主性源于对国内权力的有效整合以及关键政治精英的自主型人格特质。在应对洞朗危机的谈判过程中，莫迪政府有能力和动力规避国内观众成本，以引导对华决策的国内舆论风向。^②在莫迪政府执政前，印度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联盟政治，这严重削弱总理的权力和联邦政府的协调能力。针对此前政府权力的碎片化，莫迪通过强化总理办公室监督各部委，恢复总理直接对接各部部长的传统等手段，强化总理职权。^③另外，莫迪从小形成的务实、强硬的风格，^④赋予其上台后对华政策的灵活运用以一定的空间。赫尔曼（M. G. Hermann）指出，处于支配地位的领导者特质会对外交决策产生重大影响。^⑤这表明，权力地位会强化行为体决策时的自主性。在涉及安全和国土利益方面，莫迪政府对华保持竞争和高压态势，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则趋于合作。这种战略自主性在缓和中印关系、推动对华政策议程设置转向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军长级会谈机制是处理边境争端的重要平台。尽管莫迪政府对华一度强硬，但该机制得以启动，最低限度说明印度试图通过对话来解决争端的意愿仍存在。洞朗对峙结束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设置迎来了短暂的“回暖”阶段。在此过程中，莫迪政府会主动引导国内舆论。例如，政府建议国内涉华研究的学术会议延期召开，以避免国内反华舆论在不合适的时机爆发。^⑥

除了独立型自我图式，愿望思维也是影响行为体对他者形象知觉、决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② 谢超：《观众成本理论的局限及批判：以洞朗对峙中的印度为例》，《南亚研究》，2019年第1期，第29~54页。

③ [印] 拉贾·莫汉：《莫迪的世界：扩大印度的势力范围》（朱翠萍、杨怡爽译），第24页。

④ [印] 塔伦·维杰：《草根总理：莫迪》（唐田、刘嘉伟等译），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7~12页。

⑤ M. G. Hermann, "Explaining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Using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4, No. 1, 1980, pp. 7-46.

⑥ 关培凤、万佳：《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涉中印边界问题舆论研究》，《南亚研究季刊》，2021年第3期，第114~129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策的重要条件。愿望思维是指行为体内心的期望会主导其对信息的接收和判断。如前文指出，莫迪政府期望以自身提出的方案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这种愿望思维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解决边界争端时，莫迪政府单方面为中方设置议程，屡次提出并坚持对中方而言是不合理、不切实际的要求，显然这忽略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和能力，为谈判增加了不确定性。^①一旦中方难以满足其提出的要求，抑或印度难以通过自身实力实现其在边境问题上的诉求时，容易促使莫迪政府通过强化对华政策议程的竞争属性以达到使中方让步的目标。例如，莫迪执政后提出在与中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巡逻，积极应对边界争端；加快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改善与邻国关系，平衡中国的影响等对华新政策。^②不过，愿望思维也可能表现为积极推进双方合作的对华议程属性层面。在莫迪执政之初，印度便表达了“将中印关系由英里变成英尺”的良好愿望，随即在经贸、人文等领域的议程设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三）进一步解释

各种认知模式往往并非单独作用，而是综合作用并诱发行为者的知觉或错误知觉，进而影响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属性的演变，这也为应对莫迪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保持认知相符这一根本机制的约束下，莫迪政府调整对华政策议程主要是满足自身愿望，以保持认知一致。在既定的愿望思维下，当莫迪政府凸显对华政策的合作属性时，往往会随即向中方提出相应的要求。这样的行为模式一定程度上表明，莫迪政府倾向于认为只要自己稍作退让，中方很可能会随之做出让步。然而，一旦中方难以满足其诉求，其态度则会趋于强硬（即转以凸显竞争属性）。这种螺旋式对华政策议程的弊端在于，可能蚕食中方和平解决双方争端的意愿和耐心。在国际局势的变动下，战略自主性可能表现为印度在处理中印对抗性矛盾时，并不会因自身实力的落差而有所节制，甚至会将中国的自我克制视为是被美国遏制的结果。这种忽视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能力的错误知觉某种程度上源于其过高的愿望思维和战略自主性。总体而言，认知不相符现象往往导致什么目标也实现不了，原因在于这种非

^① 《西部地区：印方坚持不合理不切实际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新浪财经网，2021年10月11日。<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1-10-11/doc-iktzscyx8934753.shtml>

^② [印]拉贾·莫汉：《莫迪的世界：扩大印度的势力范围》（朱翠萍、杨怡爽译），第139页。

理性相符心态希望实现的目标太多，注意力过于分散而遮蔽了某些矛盾。^①为此，明确何种知觉模式在什么条件下更可能发挥主导作用，有助于今后在应对双方冲突时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

行为者的知觉和决策离不开特定的信息传递机制与具体的信息传播技术。在自由民主体制下，信息渠道多元，政府对媒介传播的管控能力较为有限。当信息输入低效时，决策者可能因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性较高的困境而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为此，不难理解为何莫迪政府制定对华决策时，以国内公共舆论（如印度教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需求特征较为明显。作为议程设置生成的重要机制，导向需求是指行为体在决策前是依靠大量的背景信息，还是仅依赖一些简单的线索引导（如党派身份等）。当行为体面临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关联性时，其决策的导向需求也更高，即更多依赖简单的线索引导。^②这种导向需求是一种理性选择，借助公共舆论风向调整对华政策，是战略自主性的体现。为此，在中印边境问题上，莫迪政府对华表现出强硬的政策态度不仅符合国内公共舆论的声音，也是出于降低不确定性的战略自主选择。这种行为逻辑突破了传统研究中单方面强调观众成本对行为体决策的约束。另外，现实条件的约束表明，在信息模糊的情况下（如瞬息万变的前线战场形势），信息及时传递和接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与中方相比，印度在边境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但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莫迪政府很可能据此而授意一线部队为阻止中方维权而率先开枪的自主权，这客观上无疑加剧双方的冲突。更明显的是，印度高层对一线部队的冒进行为竟给予默许，甚至公开奖励，似乎以顺应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这一主流公共舆论。例如，在国庆日嘉奖制造加勒万流血冲突的上校巴布。^③相比之下，中方为维护两国关系整体大局，仅保持必要的官方回应和事实报道。然而，莫迪政府难以准确理解中方发出的信号，将中方照顾其情绪和面子的做法视为中国的战略软弱，中方保持克制的低姿态反而助长其反制的信心。

总体而言，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属性表现为安全竞争逻辑和经济合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第145页。

② [美]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二版）》（郭镇之、徐培喜译），第92~99页。

③ 林民旺：《最近一轮中印边境西段对峙的回顾与思考》，《世界知识》，2021年第6期，第24~25页。

认知心理视角下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演变逻辑

作逻辑交互演化的态势，试图在其边境安全和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与中方展开有限的经济合作，即“竞争力度强化，合作空间逐渐式微”的政策议程偏好框架。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适度冒险的实用特性，以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莫迪政府的自主性表明在设置对华政策议程过程中，关键精英表现出务实型特质，这意味着其对华政策议程的设置以自我为中心，进而对华战略更主动、冒进。然而，这种战略自主性也可能驱使印度国内政治精英主动引导舆论，促进双边合作。例如，莫迪政府为推动双边合作进程，能及时识别中方的核心关切，积极管控西藏议题在其国内的发酵，降低中方在主权、边境议题上的敏感性。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发现与结论

针对既有关于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仅强调其对华政策的表现、动因等结构性视角，而忽视了从认知心理层面来解释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属性演变的内在逻辑的局限，本文尝试考察兼具冲突与合作的一国外政策全过程，为理解宏观的政策变迁逻辑提供微观认知模式的解释。在既定的信息传递机制和舆论环境背景下，行为体固有的认知模式这类更具普遍性的规律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解读和决策。与此同时，行为者的经验习得和战略自主性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克服潜在的认知局限，形成相对准确的认识，进而设置以合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议程。

在特定的利益诉求和观念主导下，莫迪政府会动员或引导国内公共舆论，同时争夺设计政策的权力，进而设置相应的对华议程。诚然，外部环境、权力关系的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可能会限定领导者认知模式的表现方式及效果。外部环境会限定领导者人格特质表现方式。^①为此，本文并非摒弃结构性视角，而是尝试从认知模式角度来解释结构性视角在何时发挥作用。当莫迪政府意识到中方给其带来的发展机遇或在边境争端上自身处于不利地位时，可能凸显以合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议程，即向中方释放善意、可沟通的信号。然而，当莫迪政府对结构性因素的知觉产生偏差时，可能会忽视或低估中方战略决心，而凸显以竞争为导向的对华政策议程设置逻辑。

^① [美] 亚历山大·乔治、[美] 朱丽叶·乔治：《总统人格：伍德罗·威尔逊的精神分析》（张清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第1~5页。

辑。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合作与竞争交互共同演进的二元特征表明,同一种认知模式可能引发冲突,也可能促进合作,这主要因情境变化以及行为体在此过程中的战略意图而异。譬如,历史类比既可能强化冲突,也可能促进合作。从冲突到合作,实现二者转换的关键驱动力可能在于一方行为体的冷静、深刻反思,及由此达成的和解。^①这种自我反思同样彰显了行为体的战略自主性。

(二) 讨论与思考

本文尝试从认知模式这一微观视角为理解莫迪政府过去七年来对华政策的变迁逻辑提供有别于既有宏观结构研究的部分解释,由此对积极应对双边关系做以下思考:一方面,对中方而言,应对莫迪政府对华政策议程的不确定性,不仅要考虑到印度政府对中印边境争端态度的历史延续特性,更要意识到行为体即时的知觉模式可能为其对华政策议程设置带来更多复杂性。为此,中方不应仅停留在和平崛起这类话语表述和传播层面,而要着实考虑对方的知觉模式。诚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在加强沟通时放弃展示自身的战略决心,而是通过展示自身捍卫领土、主权和安全的决心,以适当约束印方能动性的发挥。另一方面,对印度而言,应充分意识到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战略决心和能力,即使中方受到其他外力的牵制。只有对中方秉持的安全底线思维有清晰的认知,印方才可能调整“中方对边疆安全的诉求必然会导致对印度北部地区的威胁”这类传统理念,否则将从根本上制约双方战略互信和合作机制的有效建立与维护。

为应对莫迪政府既有的锚定思维、自我图式以及愿望思维等认知模式可能造成错误识别中方的信号或意图等局限,应建立并维护中印双方沟通、对话的第三方平台机制。这种第三方平台机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在于充当中印战略互动的缓冲地带。另外,第三方平台的功能还在于积累、扩散过去处理双方关系的成功经验,当双方再次面临类似冲突时,既可及时启动、释放既往的应对经验,也可及时规避过去引发冲突的教训,进而为处理当前所面临的争端提供参考,切实推进中印关系行稳致远。

(编辑 边巴拉姆)

^① Tang Shiping,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Vol. 63, No. 4, 2011, pp. 711-749.

context of these changes,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role it plays in consolidating the all-weath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strategic dilemma that Pakistan faces with respect to three critical challenges: China-U. S. competition, confrontation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t also considers Pakistan's four key domestic governance dilemmas, and strategic adjustments that Pakistan is undertaking around each: nation-state building, political transition, security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argues that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provides a significant, but not decisive boost for Pakistan as it responds to these global changes.

KEY WORDS: China-Pakistan Relations; Pakistani Diplomacy; Pakistan National Governance; Pakist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ighborhood Diplomacy

Cognitive Perception and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Modi Government's China Strategy

By Hou Weigang

ABSTRACT: A state's foreign policymaking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robust information flows and effective cognitive mechanisms for interpreting information. As such, it is easy for issues to emerge around how cognitive patterns affect the foreign policy agenda. Based on micro-psycholog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ary logic causing states to sometimes adopt foreign policy frameworks emphasizing cooperation, and at other times to turn in the direc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is direction, the study considers the cas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i government's China policy. In order to maintain 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 Modi administration will use anchoring effects, including induced stereotypes and historical analogies, as well as wishful thinking and independent self-schema to interpret China's intentions, and to appraise the scenario faced by India. This in turn will serve as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policy towards China. This illustrates how strategic autonomy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Modi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situation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 general guiding needs are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that will tilt the Modi government in the direction of adopting a hardline policy towards China. By reviewing the last seven years of history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with China vis-à-vis the Modi administration's policie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evolution of a state's foreign policy from a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nherent cognitive limitations, the Modi administration has emphasized competition in its policy towards China, while cooperation

remains limited in general.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s insight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that can help manage differences between states.

KEY WORDS: Modi Administration; India's China Policy Agenda; Anchoring Effect; Strategic Autonomy; Cognitive Limitation

Repeated Games, Complex Competition and Dynamics on the Sino-India Border

By Cao Pengpeng & Feng Huaixin

ABSTRACT: The Sino-India border conflict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simple competing territorial claims, and instead is rooted in a complex set of realistic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s tend over the long-term towards predictable and stable cooperation as rational players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following a retaliatory strategy of tit-for-tat. The theory of repeated games roughly explains the basic logic that India and China followed in gradually de-escalating the border conflict following the 1962 border war. While so,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conflict in the China-India border region has increased, especially since 2020 when a violent conflict broke out in the Galwan Valley, leading to an ongoing standoff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because of complex competition around the respective status of India and China, and related to their geo-strategic space, as well as due to dynamics vis-à-vis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has started to experience a form of ontological insecurity. If India wants to overcome its current passive position vis-à-vis the border standoff, it needs to enhance its deterrence vis-à-vis China.

KEY WORDS: Repeated Games; Border Conflict; Complex Competiti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China-India Border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Joint U. S. -India Military Exercis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y Yu Xiang & Wang Do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U. S. -India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comes of U. S. -Indi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evolution of th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can be split into three respective phases: First was a pilot phase follow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aimed to expand U. S. -India cooperation; Second was a phas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and routine joint exercises at many levels between multiple branches of the U. S. and Indian armed forces following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third is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coordination vis-à-vis China that has emerged since 2014, and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form